

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

(1949 - 1966)

徐 玲

内容提要 1949 - 1966 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新博物馆建设是时代迫切的任务,但囿于国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新馆建设,而数量众多的传统庙宇建筑因其特有的公共空间性,成为博物馆馆舍优先再利用的主要建筑类型;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体系建构中,多数传统庙宇建筑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负面标签,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文化行列。此时段博物馆建设者虽然巧妙地利用了传统庙宇建筑特有的公共空间,将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场域,部分完成了传统庙宇与博物馆的角色置换,但是,整体上仍然无法有效融合两种空间的差异性。

关键词 传统庙宇建筑 公共空间 博物馆史

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利用传统庙宇建筑^①改作博物馆馆舍现象出现较早^②,有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的多数博物馆就倾向于再利用传统庙宇建筑,具有浓重的古典主义风格^③。1949—1966年博物馆建设继承了早期博物馆的做法,利用传统庙宇建筑改建的博物馆数量占比例很大。因此,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关系的探讨,无疑是深入认识此时段博物馆性质的最佳视角之一。遗憾的是,因博物馆学整体研究力量的不足,博物馆史的专题研究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故从建筑空间探讨博物馆发展变化的研究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博物馆史研究(1949—1966)”(18BKG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的“传统庙宇建筑”特指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的具有祭祀、朝圣及公共空间性质的传统建筑,按照空间类型分为供奉神祇的道观、寺庙及祭祀先祖的祠堂等,暂不包括宫殿、官衙及学院等古代建筑。

② 中西早期博物馆史上不乏利用传统建筑改作博物馆的案例。欧洲早期博物馆多建在收藏者的宫殿、教堂、修道院或府邸里。近代中国博物馆借用传统建筑改造的先例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传统建筑改建博物馆的数量就有13座,除却故宫博物院借用故宫建筑群外,典型的还有:1905年建在天津旧城东门外玉皇阁的天津教育品陈列馆;1912年借用国子监建筑筹建的国立历史博物馆;1927年,借开封三圣庙建立的河南博物馆;1929年,借用王阳明寺、文澜阁、圣因寺罗汉堂等筹建的西湖博物馆等。近代中国传统建筑博物馆化的情况详见李国鳌《1949年前的中国博物馆建筑》(《博物馆研究》2006年第3期)、项隆元《近代形态博物馆的诞生与博物馆建筑类型的形成》。

③ 前揭项隆元:《近代形态博物馆的诞生与博物馆建筑类型的形成》,《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果十分缺乏，针对1949—1966年间博物馆建筑文化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更加稀少⁴¹。本文尝试在整理1949—1966年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化的基本资料基础上，从这一时段传统庙宇建筑的博物馆化的再利用、博物馆对传统庙宇建筑公共空间性的继承以及传统庙宇建筑作为博物馆空间的困境等三个方面，深入考察1949—1966年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的关系，以期细化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

一 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化的再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随着国家政权性质的变革，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步骤，已有文化设施、建筑和机构等均需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下重新评估，由此传统庙宇建筑的改造、价值重置等提上新建设日程。但是，由于传统庙宇文化关涉传统社会信仰习俗，在民间社会影响很大，所以又使作为庙宇文化载体的庙宇建筑的处置问题变得十分复杂。

国际上将博物馆建筑大体分为由寺庙、宫廷、古堡、隐修院、历史遗址改建及新建等类型⁴²。在博物馆发展史上，因为空间功能的某些相近性，庙宇建筑的博物馆再利用开始较早。民国时期传统庙宇也多被视为收藏保存古物、建置博物馆的最佳场所之一。1912年，新成立的北京政府教育部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时，阐述选址国子监的缘由如下⁴³：

国子监旧署，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收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古之资，实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当以国子监一处所有辟雍等建筑，在前清时迭经儒臣考订，宏此规模，关系历史学术者甚巨，于历史博物馆性质甚为合宜。

1913年，北京政府颁布的《临时政府内务行政纪要》“设立古物保存所”条提出，“先就原属国有之古

〈1〉 对本文启发较大的研究成果有关听的两篇论文：《文物建筑再利用的博物馆化研究》（《中国博物馆》2017年第2期）集中讨论了被定为文物的建筑类型的博物馆再利用情况，认为再利用过程，不仅体现了建筑本体的功能转换，同时也体现了文化空间价值观念上的微观重构；《民俗文化与传统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则从民俗学角度探讨了博物馆与庙宇文化的关系，认为文物古迹通过再利用，被赋予了新的使用机能，转换为新的博物馆空间，体现了文物基础价值认定上文化意涵的再延伸和价值转化。相关研究还有：马若予：《中国博物馆建筑历史沿革及发展概况》（《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认为1949年后传统建筑虽在博物馆建设中仍发挥作用，但处于非主流状态。阳洋：《意象与抽象——博物馆建筑形态构成初探》（重庆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提出博物馆建筑意向的三种形态，其中文脉意义的塑造形态与传统庙宇建筑的博物馆化有所关联。项隆元：《中国博物馆建筑的百年回顾与分析》（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的百年发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则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博物馆建筑特点。美国学者贾斯廷·哈德森（Justin Henderson）在《博物馆建筑》（贾斯廷·哈德森（孙硕译）：《博物馆建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博物馆建筑中历史建筑类的文化传承性等。

〈2〉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印：《博物馆学参考资料》页105，1986年。

〈3〉 《教育总长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大总统批（1914年6月2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页27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物寄存各坛庙者，移存该所，分类陈列”¹¹。内务部同时从清廷接收了多存有古物的孔庙、太庙、关岳庙等庙宇，如孔庙中当时存放有周代石鼓、铜器等礼器。1929年，“无锡市政筹备处”提出“筹设历史博物馆”的计划，拟议在无锡孔庙原址，在既有的祭器、乐器基础上，征集文献古物，创设“县立历史博物馆”¹²，同样关注的是两者具有公共空间的相似性。有趣的是，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时，对庙宇的使用更加普遍，如古物迁运至宝鸡时，暂存在关帝庙和城隍庙中；迁运至汉中时，藏于汉中文庙和马家祠堂、范家祠堂等；至川北广元县城时，存放在三元宫和香林寺；成都时存放大慈寺内；彭山时，物色了禹王宫、万寿宫、武庙及火神庙等。有研究认为当时多使用传统建筑改建博物馆或存放文物的原因如下：“为了减少国人的陌生感，早期博物馆多利用古刹、寺庙、祠堂、县衙、官府、书院、公馆、园林等场所作初创时的馆址，许多博物馆甚至直接利用了书院、寺庙原有的房舍来展陈。这些设施本身为传统社会民众聚集场所，具有公共空间形态，博物馆建设者希望借此有效降低形式上的冲突。”¹³突出强调的是传统建筑与博物馆的公共性。

1949年后，新政府为改造已有博物馆、筹建新博物馆，先后颁布了多项法令，如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¹⁴。随后颁布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宣布一切具有革命、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图籍和珍贵文化遗产，均必须妥善保护，不得破坏或盗卖¹⁵。同时颁布的《关于切实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提出，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有关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郭、宫阙、关塞、堡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¹⁶。1951年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了博物馆的任务——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提出博物馆建设仍应以改造原有的为主，仅个别有条件地区筹建新的博物馆¹⁷。限于当时国力，有条件新建博物馆的地区很少，传统建筑改造博物馆成为国家的优选项。

统计1949—1966年国家博物馆总数共232座，历史建筑类¹⁸博物馆达143座，占总数约60%，其中传统庙宇建筑居多。当时传统庙宇建筑改建成博物馆大致有两类情况，其一类是建筑已被改造为与博物馆

〈1〉 《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1913年10月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页3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2〉 顾文璧：《记江苏省早期博物馆之——“无锡县立历史博物馆”》，《文博通讯》1984年第4、5期合刊。

〈3〉 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页166，科学出版社，2015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人民出版社，1950年。

〈5〉 《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见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法规文件汇编(1949—2009)》，文物出版社，2009年。

〈6〉 《政务院发布指示切实保护古文物建筑》(1950年7月30日)，《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7期。

〈7〉 《中央人民文化部指示》(1951年10月27日)，《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2期。

〈8〉 此处历史建筑范畴比传统庙宇建筑宽泛，除道观、寺庙、祠堂外，尚包括传统宫殿、学院、宗庙、会馆等。

相关的文化单位，简单更名后重新以博物馆名义开放，如1919年以崇善寺废址改建的山西省教育图书博物馆，1949年经由人民解放军太原军事委员会文教接管组接管，更名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后直接开放使用。此类博物馆数量为11座，详见[表一]：

[表一] 1949年前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及1949年后的改造一览表

庙宇	博物馆	建立时间	博物馆	改造时间
文庙和纯阳宫	山西省教育图书博物馆	1919	山西省图书博物馆	1949
三圣庙	河南博物馆	1927	河南省博物馆	1949
郫县东岳庙	四川博物馆	1941	川西人民博物馆	1949
越秀山镇海楼	广州市立博物院	1929	广州博物馆	1950
碑林前孔庙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1944	西北历史陈列馆	1950
天津广智馆	天津市立美术馆	1929	天津历史博物馆	1952
东岳庙	中国西部博物馆	1943	西南人民科学馆	1952
西湖公园古建筑群	福建省立科学馆	1933	福建省博物馆	1953
文澜阁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1930	浙江博物馆	1953
后土庙	介休县博物馆	1921	介休县博物馆	1955
南阳武侯祠	南阳市民众教育馆	1935	南阳汉画馆	1958

备注：笔者搜集整理。因民国时期博物馆馆址已有经常变动现象，1949年后改造中博物馆名称也出现多次变更。

另一类是建筑保存较完整，年代较近，经简单修整后挂上博物馆的匾牌直接对外开放的，此类博物馆数量多达43座，详见[表二]：

[表二] 1949 - 1966年传统庙宇建筑改建博物馆一览表

庙宇	博物馆	建立时间
陈氏族祠	平和暴动纪念馆	1951
史公祠	扬州文物馆	1951
高座寺	雨花台烈士史料陈列室	1954
杜公祠	杜甫纪念馆	1955
烈士祠	郑州市文物陈列馆	1957
林则徐专祠	林则徐纪念馆	1957
云山古寺	瑞金革命纪念馆	1958
关林	洛阳博物馆	1958
岳飞庙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1958
伏羲庙	天水地区博物馆	1958
关帝庙	亳州市博物馆	1958
金台观	宝鸡市博物馆	1958
青浦城隍庙	青浦博物馆	1958
袁林	安阳市博物馆	1958
三元里古庙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	1958
鳌头矶古建筑群	临清博物馆	1958
颜文姜祠	淄博市博物馆	1958
清凉寺	常州博物馆	1958
惠山淮湘昭忠祠	无锡市博物馆	1958
华严寺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	1959
大广济寺	辽沈战役纪念馆	1959
资福寺	“四·九”起义纪念馆	1959
祖庙	佛山市博物馆	1959
云门寺	湘乡县博物馆	1959
陈家祠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1959
湘鄂纪念馆	永新湘赣革命纪念馆	1959
杨升庵祠	杨升庵纪念馆	1959
聂士成祠堂	天津市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1959
武侯祠	南阳历史博物馆	1959
苏公祠	凤翔县博物馆	1959

(续表二)

庙宇	博物馆	建立时间
“忠烈祠”祠堂	梅县博物馆	1959
花戏楼	亳县博物馆	1959
定陵	定陵博物馆	1959
开元寺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1959
泰山庙	盐城县博物馆	1961
李鸿章祠	辛弃疾纪念祠	1961
郑氏宗祠	石井郑成功纪念馆	1962
华祖庵	亳州市华佗纪念馆	1962
云岭村陈氏宗祠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1962
悦岭庵	普陀山文物馆	1962
碧霞宫	浚县博物馆	1963
报恩寺	寿县博物馆	1964
万源祠	古田会议纪念馆	1965

备注：建筑建造年代以修缮时间为准。

综合两个表格统计可以发现，1949—1966年利用传统庙宇建筑而建的博物馆数量多达54座，为本研究提供了足够的体量。

二 博物馆对传统庙宇建筑公共空间性的继承

博物馆之所以优先选择传统庙宇建筑作为馆址，核心的因素应是两者公共空间性上的关联度较高。庙宇建筑空间属于中国传统社会官方之外并不多见的公共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加强民间社会文化认同和地方精神凝聚等方面作用极大。

历史上，庙宇长期作为所在地的文化、政治及经济商贸中心，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仪式展演及经济商贸聚集等独特的功用。许多作为宗教场所的著名庙宇同时还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表达、地方教化、祭祀及文化物品收藏等多重任务。而传统社会的祭祀活动经过长期强化已然被固定在庙宇中，又赋予了庙宇正统性的政治身份，如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宣告宋王朝的正统性，曾假托轩辕黄帝生于寿丘的传说兴建了属于原庙体系的景灵宫、寿陵等用以祭祀黄帝。而后金人征服此地，对作为宋皇家宗庙意义的景灵宫格局进行了破坏性的改动，寓意宋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丧失。美国艺术史家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同样认为¹³：

和古代的纪念性建筑一样，博物馆除了完成它作为博物馆使命（保护和展出艺术品）之外，还有着更广义的使命，即有时候会或多或少地承担起宣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色。

再看广布民间的传统祠堂作为宗庙在民间社会的变体，同样具有纪念先祖、教化族人、文化认同及文化物品收藏等特殊功能，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王权时代，祠堂几乎成为聚族而居的民间社会的国家代

¹³ [美]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作为仪式的艺术博物馆》，见[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陈双双译):《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页14,译林出版社,2014年。

言空间，因此掌控或争夺祠堂空间话语权成为民间乡绅的要务之一，也是乡绅及其宗族在村落中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掌控祠堂话语权的乡绅、大宗同样重视所在地庙宇的管理权，如山西的村落中大姓宗族长期关注一些固定庙宇的修葺，后起强势家族也常通过建设公共设施，包括庙宇和村内道路、水井等方式在村落建立权威并且实施话语权和控制力，使其家族的合法性得到承认⁴³。如此，传统庙宇建筑不仅是国家、地方政治合法性的特殊载体，同时与博物馆一样是可制造意义的公共空间，如山西省介休县新东村内的观音堂，据清嘉庆时期的《介休县志》记载⁴²：

维斯堂在百室之中，农人得憩夏畦，行旅获舒劳足。而且月朗风清，野老常于此话桑麻、论今昔。既有讼端，可以解纷，或有发召，可以集议。

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时也是人们劳作或旅途休息的地方，是村民闲聊、商讨议事的地方。这类公共领域的性质为传统庙宇建筑的博物馆化提供了基本条件。

早期博物馆发展史上，在定义中多直接用博物馆建筑本身来指称“博物馆”，预示着建筑并非仅是博物馆的一个简单的容器，而是具有更加丰富的意义。同样，作为传统信仰空间的庙宇建筑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物理建筑空间，而是承载着多种文化意义的公共符号空间，即集接纳人、事、物公共活动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修道院等宗教场所，多兼备博物馆的收藏、教化功能，大量收集奇珍物品用来对信徒进行宗教教化、传播教义。至今在源自此类收藏的博物馆早期展柜上，仍然可以发现宗教建筑的一些特色，反映着早期博物馆要求与展品和宗教场所保持和谐一致，以便衬托展品的典雅端庄与宗教场所的富丽堂皇等。这也正是博物馆学观点所强调的，最有说服力的博物馆概念和设计能呈现出建筑和藏品之间的相关性，文化功能性的一致性。回到中国传统庙宇建筑空间，同样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在传统中国，庙宇建筑空间除却建筑本体外，还多收藏有雕塑、绘画及碑刻等装饰品，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地理环境上，因为庙宇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多数庙宇选址位置优越，空间开阔，从而利于大规模人群的集散。为了满足信仰教化的需要，多数庙宇还建有专门的戏台、学校、市集等，定期提供戏曲展演、学校教育等传播教化意旨的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民间受众，最终成为建构文化认同和地方认同的重要公共文化空间。而传统庙宇建筑的公共空间性在1949—1966年的博物馆建设活动中得以继承。

三 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再利用的困境

在传统中国社会“道器观”中，建筑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具有直观传播信息的优势，即“物以载道”，因此古建筑的更大价值，体现在其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象征和情感认同上。这种象征价值和情感认同价值甚至已超越建筑物质层面的浅表价值，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凝固符号。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当

41> 姚春敏：《清代山西杂姓村宗族祠堂、祖茔及庙宇建设——以碑刻、族谱、村志和田野调查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2> 侯清柏编：《介休县志·嘉庆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下需求重建或改建传统建筑几乎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表达，“中国古代有重建损毁建筑之传统，或因表达文化传承之精神，或因地方记忆再现之需要”¹。可见，传统庙宇建筑的重建或改造利用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为一种常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庙宇的改造利用更多重视的是古建筑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而人文价值的强调和阐释可以满足当下教化人的目的，在价值载体选择上常基于一种人文价值的选择判断：“一个统治者会运用某个场馆来反映他的意志以及对未来大道理想，这从建筑上也看得出来，例如国会、首相官邸、纪念碑等都是。执政者经常将发展方向、领导人的理想投射在巨大的建筑物上，因为建筑可说是象征时代的精神。如果说巨大的建筑物是硬件，博物馆可说是体现统治意识的软件的代表。展示的内容及方式包含了领导人的理想。”²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庙宇文化与博物馆文化之间的悖论，又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对传统庙宇建筑使用上的困境。

当时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再利用的困境十分明显，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厘定下，传统庙宇文化被贴上了“封建迷信”“落后”等负面标签，被归类于中国近代以来教育中不遗余力地所倡导驱除或清除的事物。近代肩负宣传科学、民主重任的博物馆的引入就带有驱除传统庙宇文化的“封建迷信”的特定时代使命。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相应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传统庙宇文化明显存在亟需被修正或改造的问题。但是，如何修正或改造传统庙宇文化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措施，重新改造利用传统庙宇建筑现象相应十分混乱。据《中国寺庙宝典》一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传统庙宇建筑的统计，收录的841座庙宇的沿革中，1949—1966年有明确记载的仅有84座，加上“庙产兴学”“由坛入园”的政策影响，除博物馆使用外，被部队、医院、粮库和厂房等占用的庙宇数量也不少³。

实际上，从哲学层面上看，文化遗产并不都是积极遗产，即使负面遗产也同样能够被传承和分享，而如何传承和分享负面遗产又涉及传承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对此巫鸿强调说：“‘纪念性’的艺术、建筑和城市总是承担着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和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⁴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并没有为辩证对待传统负面文化遗产留下余地，无法解决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再利用的困境。

传统庙宇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如何建立建筑与藏品之间的相关性，在当时同样成为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一般而言，文化上的传统性，同时也有异己性，甚至包含更多的被当下政权所反对或需要遮蔽的负面性。双方如何转换，又成为纠结于当下与历史之间的一个棘手问题。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

1. 王新文等：《试论“重建”之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东南文化》2016年第6期。

2. [日]野岛刚(野島剛)(张惠君译)：《两个故宫的离合》页208，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3. 张羽新主编：《中国寺庙宝典》，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4. [美]巫鸿(李清泉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性”》页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庙宇在传统社会信仰中的日常性不得被截断，甚至被作为“封建迷信”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事物。英国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说：“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博物馆以革命史类、历史文物类为主，高度要求政治性和群众教育性，这些均要求必须在庙宇重构的博物馆空间内重新诠释新的文化追求，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传统庙宇文化本身的文化符号却并不足以担此大任。

从文化分层理论上，浅表层即物质本体文化虽易于借用、传播或交换，但物质所包含的意识文化或精神文化却并不易被新文化所消解或接受。传统庙宇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属于古迹类博物馆，庙宇建筑及庙宇文化成为博物馆独特的藏品和展品。但是，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化需求的政治变革，庙宇原有文化的合法性受到冲击，如何对庙宇承载的文化记忆进行释读，成为博物馆工作者面临的困境。尽管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强调对传统的继承^②：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实践中，1949年后的传统庙宇文化仍被认定为负面文化，划入国家要消减的文化之列。如何分割建筑与其历史人文活动内容就成为传统庙宇博物馆再利用的一大难题。

除却文化观念上的正面与负面、新与旧的矛盾，当时尚存在传统庙宇建筑空间与博物馆展陈空间的功能性的不匹配问题，以传统信仰为核心的庙宇建筑空间如何来表达新的博物馆文化？如果说，人文环境精神方面，传统庙宇与博物馆文化之间存在的抵牾，尚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文化改造、意识形态置换来完成，那么建筑空间上两者的调和就很难处理了。一般传统庙宇建筑空间都比较狭小，那么博物馆作为知识传播的展示空间，不但需要宽敞明亮连续的展陈空间，同时还要顾及参观者的空间安全设置，加上庙宇建筑难以满足博物馆藏品库房的特殊要求等，在保护传统建筑形态的法令要求下，空间改造难度很大，尤其是陈列空间的局限给博物馆工作带来极大困惑。陈列空间的不足也是导致此后许多博物馆搬离传统庙宇另建新馆的重要因素之一，如1917年7月7日，因国子监地处偏僻，屋舍狭隘，无法进一步展开工作，博物馆筹备处就奉教育部502号令将馆址迁往故宫的端门、午门处。

总之，1949—1966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产生的传统庙宇建筑博物馆化现象，既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传统公共空间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文化观念上的不兼容性，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探讨，既充满趣味性，又充满挑战性。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考古学系]

(责任编辑：何芳)

① [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阎嘉译)：《后现代的状况》页299，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页522，人民出版社，1991年。